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七編 4

從道場到戰場：試論武道的轉化機制  
以殖民地台灣為例

馮啟斌·著

現代到後現代

戰後台灣現代詩的空間書寫

沈曼菱·著

#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輯刊

七 編

第4冊

從道場到戰場：試論武道的轉化機制  
——以殖民地台灣為例

馮啟斌 著

現代到後現代  
——戰後台灣現代詩的空間書寫研究

沈曼菱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道場到戰場：試論武道的轉化機制——以殖民地台灣為例  
馮啟斌 著／現代到後現代——戰後台灣現代詩的空間書寫研究  
沈曼菱 著——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  
〔民 104〕

目 2+106 面／目 2+112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七編；第 00 冊)

ISBN 978-986-404-174-9 / 978-986-404-175-6 (精裝)

1. 武士道 2. 日據時期 3. 臺灣 / 1. 臺灣詩 2. 新詩 3. 詩評

733.08

103027815 / 103027816

ISBN-978-986-404-174-9



9 789864 041749

ISBN-978-986-404-175-6



9 789864 041756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七 編 第 四 冊 ISBN：978-986-404-174-9 / 978-986-404-175-6

從道場到戰場：試論武道的轉化機制

——以殖民地台灣為例

現代到後現代

——戰後台灣現代詩的空間書寫研究

作 者 馮啟斌／沈曼菱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七編 10 冊 (精裝) 新台幣 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從道場到戰場：試論武道的轉化機制  
——以殖民地台灣為例

馮啟斌 著

## 作者簡介

馮啟斌，政治大學新聞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畢業，現就讀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半路出家的台灣史、台灣文學學習者，希望藉由每一份渺小的研究作業一步步瞭解自己出生的土地。

## 提 要

為了確實掌握在殖民地台灣的武道修練是如何對殖民地人民產生影響，本文將「武道」與「武士道」視為被發明的傳統，在日本近代國家成立以後，融合近代國家國民道德所創造出來「武（士）道」，係透過與兩個他者的對話所產生。一是歷史上長久以來對日本具優位性的中國，對話的過程中產生「中國＝尚文＝懦弱」／「日本＝尚武＝勇猛」的二元對立結構。二是 19 世紀末狹帶強大、先進器械與科學逼迫日本的諸西方帝國，在與西方文明來往的過程中，「西方＝智＝物質主義」／「日本＝德＝精神主義」的二元對立結構逐漸成型。藏在近代「武（士）道」背後的這兩組對立結構，直接影響殖民地台灣人民對武道修練的認知，以及透過武道修練的目的。

總動員戰爭的出現，使得國家權力大幅介入人民生活的每個面向，前述兩組二元對立結構往兩極發展而愈形偏激。武道修練隨著國家需要大量忠君愛國的人力資源而大幅獲得發展空間，殖民地台灣人民因此較為普遍地接觸武道。然而，武道修練並非只是單純強身健體，在國家機器的強力介入下，藉由將「道」的修練空間，從特定的道場轉為無時無刻、無所不在的「道場」，生活中的每個面向都是實踐國民之道、臣民之道的場所，理由在於總動員戰爭（總力戰）要求國民無分前線、銃後，無分戰鬥人員或平民，人人一心為國家犧牲、奉獻。在這個時代脈絡下的武道修練，是將人民從修練武術的特定道場帶向戰場的機制。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緣起	1
第二節 作為提問原點的〈奔流〉	2
第三節 文獻回顧	4
第四節 核心論點與章節安排	6
第二章 被發明的「武（士）道」	9
第一節 大日本武德會的成立與武道的現代化	9
第二節 近代發明的「武士道」思想	14
第三節 武道與學校教育	20
第四節 小結	27
第三章 邁向戰時體制的武道修練	31
第一節 武道在殖民地台灣的開展	31
第二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覺悟	42
第三節 「精神立國」的武道	48
第四節 小結	61
第四章 從道場到戰場	65
第一節 初等教育中的武道	65
第二節 殖民地臺灣的道場化	74
第三節 賦予「死物」生命的英勇靈魂	84
第四節 小結	90
第五章 結論	93
參考文獻	101
謝誌	107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緣起

數年前首度到日本東京自助旅行，參觀明治神宮時，偶然在神宮弓道場「至誠館」前看到弓道教室的招生公告。我對弓、箭向來有莫名偏愛、打定這輩子若有什麼非做不可的事，習射即為其一。那張海報喚醒我習射的宿願、也同時引起我對「弓道」的好奇。一般常見的射箭競技（西洋射箭），在日文中是以片假名寫「archery」這個單字來表示（即アーチェリー），日本傳統射箭術則以漢字寫成「弓道」。由於當時我不懂日文，只能讀漢字，偶然喚醒我學習射箭的契機因此不是西洋射箭，而是日式射術：「弓道」。

旅行返台後的新學期，母校政治大學湊巧有同學準備成立弓道社，聽聞此消息，我毫無遲疑地加入社團、開始接觸這項日本傳統武術。除了技術層次的練習，也從知識層面上對「弓道」產生好奇。在台灣，一般對劍道、柔道或許並不陌生，但對弓道卻幾乎未曾聽聞。我曾數次拿著弓走在路上，手上的弓被誤認為釣魚竿、曬衣竿甚至甘蔗，穿著「稽古着」（練習服）則總被認為是劍道或柔道的學習者。這些經驗指向一個問題：劍道和柔道在戰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雖一度因帶有日本色彩被短暫禁止練習、推廣，其後皆因實用目的再度復興，唯弓道在戰後五、六十年間未見公開活動，為什麼？〔註

---

〔註 1〕 平安時期源義家向臥病在床的白河天皇獻上弓矢，一方面象徵戰爭的功績、另一方面有驅邪破魔的效用，舉這件逸事為例，可知弓矢或弓道有很強烈特定象徵意義。柔、劍道或可因其在格鬥或鍛鍊體魄的實際效用，即使在戰後

1) 循著這個疑問，我認識到原來在中世紀的日本，武士的技能或者習風通常用「弓馬之道」或「弓矢之道」來指稱。相對於劍道、柔道的實際效用，弓道較著重禮儀、道德、精神修養層面，料想正是因其日本色彩太重，在強調中國正統的戰後國民黨統治典範下，才始終沒有重新於這塊土地復甦。不只是國民黨政府，戰後的聯合國最高司令部也曾下令禁止日本人修練武道，理由是其與軍國主義關係密切。這便引奇我的好奇：曾經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是否也曾經受到「與軍國主義關係密切」的武道影響？

讓我產生前述提問的另一個偶然是，在我加入弓道社團的大四這年，我開始接觸台灣歷史。中學時代我所學習的教材不若今日已大幅調高台灣史、地的比例，加上大學並非台灣歷史、文學相關科系，我對自己成長的這塊土地一直很無知，甚至很少意識到自己的無知。在參與台灣史相關的研討會和閱讀後，方才深深察覺過去竟對這麼多與自己切身相關的人、事、物視而不見，念碩士班後，便決定轉而面對台灣史的相關問題。

這兩個偶然結合在一起，非但引領我開始學習日文，也讓我追問：日本政府為什麼要將武道修練引入殖民地台灣，是否以之為手段教化殖民地人民？而殖民地台灣人又是如何面對這項日本傳統武術？等等諸多疑問領著我找到一篇日本時代末期著名的小說：〈奔流〉。

## 第二節 作為提問原點的〈奔流〉

王昶雄〈奔流〉的主述者「我」，因父親逝世不得不放棄在東京的附屬醫院臨床醫師職位及解剖學教室研究生身份，回到故鄉台灣接任父親的內科診所。以此為故事開端，「我」回到故鄉後，正為封閉單調的生活感到沉悶時，結識了伊東春生。伊東春生本姓「朱」，在日本求學時攻讀國文（日文），返台後擔任中學國文科教師，與日本人妻子及妻子的母親同住，並改成日本姓氏「伊東」。這篇小說即以主述者「我」、伊東春生及伊東的姪子林柏年為中心開展。

對於林柏年來說，伊東春生是個「拋棄自己的父母過著那樣的生活，只

---

不同的政權統治典範底下仍能被接受，但弓道則很可能因為缺乏實際效用，同時是儀式性十分強烈的技藝，被視為日本精神、日本傳統的象徵而遭禁止。另外，相較於劍、柔道，弓道在練習場地及練習器具的需求較嚴苛，也是造成弓道傳承困難的主因。

認為自己過得快樂就好」〔註2〕的人，林柏年對伊東春生爲了成爲日本人而拋棄生父母的行爲非常不諒解，並在態度上表現出對伊東的反抗，然而伊東春生將林柏年對自己的反抗等同於本島人的劣根性，需要透過教育從根本改造，他說：

長久的教育生活中，這樣的場面，也應該考慮到。不知道是誰說的，陶冶學生，不僅是磚塊的堆積，每天的經營，多半需有等時性。尤其本島人學生常有的乖僻的性情，非從根柢重新改造不可。〔註3〕

面對伊東春生拋棄生父母的行爲以及鄙視本島人自視優越的態度，林柏年選擇透過修練劍道以及在劍道比賽中打敗日本人來超越對伊東的怨恨：

無論怎樣艱苦，一定要堅持下去。本島人每天像三頓飯一般地被罵成怯懦蟲，實在受不了。還有，在打垮那些身爲本島人，卻又鄙夷本島人的傢伙的意義上，我也要拼命〔註4〕。

爾後本島人在全島劍道比賽取得勝利，「我」說：

那並不是做夢，本島人終於把劍道，變成自己的東西了。多半是心和技一致了，所謂能虛心坦懷地應戰的結果吧，或是激烈如噴火的鬥志，壓倒一切了吧。無論如何，獲勝了。州下的稱霸，和全島的稱霸是一樣的。被欺侮爲膽小如鼠的事，現在已成古老的故事了。現在就要吹滅卑屈的感情，本島年輕人正要開始飛躍了。我欣喜之餘，氣都喘不過來了。胸部無端地膨脹起來，無法抑制活活的血正在奔躍。〔註5〕

在劍道比賽取得優勝便得以超越「身爲本島人，卻又鄙夷本島人的傢伙」背後的邏輯爲何？「我」所說的「把劍道，變成自己的東西」意謂著什麼？在獲勝後，本島人「被欺侮爲膽小如鼠的事」即成爲「古老的故事」的想法，是在什麼樣時代脈絡下成立的言說？這些問題涉及包含武道的修練目的等相關問題：日本統治者是如何定義武道的內涵？在統治層面上武道有什麼功能？被統治的本島人透過修練武道能達成什麼？

本文將「武道」或「武士道」視爲應被問題化的概念，以及一套「轉化」

〔註2〕 王昶雄，〈奔流〉，《王昶雄全集：小說卷》（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2年），頁340。

〔註3〕 同前註，頁339。

〔註4〕 同前註，頁350。

〔註5〕 同前註，頁351。

機制，透過這套機制，德行的具體實踐將順應國家意志在「適當」的地方發生。當然，這套機制的運作必須放在特定的時空脈絡下才得以成立。主要的時空軸線有二：戰爭與殖民地。本文將以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台灣為例進行考察。台灣係因日本在 1895 年戰勝中國清朝才成為日本殖民地，以這場戰爭為始，經由戰爭產生的價值觀便已開始影響日本統治者對殖民地人民的評價法則。爾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出現總力戰（總動員戰爭），使世界各國更積極地將非前線戰鬥人員、一般人民召喚到戰爭的力場內，這鼓拉力一鼓作氣連結到日本三〇年代的十五年戰爭時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致使日本領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至十五年戰爭時期，本文以戰爭為主要時間軸線，針對這些時間帶上出現的武道相關言說與主張提出分析與討論，以殖民地台灣人民為例，說明作為「轉化」機制的「武（士）道」是如何運作並影響人民。

### 第三節 文獻回顧

關於台灣日治時期的武道發展，已有數篇論文從不同角度切入研究，根據現下累積的研究成果，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民，無疑曾經接觸、知悉甚至修練過各種武道。根據陳信安〔註 6〕在〈臺灣日治時期武德殿建築之研究〉中的考察，修練武道的場所：道場或武德殿，在日本領有台灣的五十年間，遍佈全島各大小鄉鎮，總督府亦常在武德殿舉辦各種公共性質的活動（不限於武道活動），可以推測對於殖民地台灣人民而言，武道及武道修練空間並不陌生。

推廣武道最重要的組織，當屬明治二十八年（1895）成立的大日本武德會。辛德蘭的文章〈日治時期臺灣的大日本武德會（1900～1945）〉〔註 7〕便以《臺灣警察協會雜誌》及總督府公文和《臺灣日日新報》等相關資料，整理、分析大日本武德會臺灣分會的組織發展狀況如會員、例行公事。陳義隆〔註

〔註 6〕 陳信安，〈臺灣日治時期武德殿建築之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註 7〕 辛德蘭，〈日治時期臺灣的大日本武德會（1900～1945）〉，《兩岸發展史研究》（第二期，2006 年 12 月）。

〔註 8〕 陳義隆，〈日治時期臺灣武道活動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8) 在〈日治時期臺灣武道活動之研究〉中，除了交待大日本武德會的成立脈絡外，更進一步深入討論大日本武德會臺灣支部的組織架構、會員以及各項定期行事。鄭國銘的〈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體育組織及其運作的歷史考察〉〔註9〕以及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註10〕二篇博士論文，從體育發展的角度切入，對於台灣日治時期體育組織的發展各有相當詳盡、深入的討論與描繪。大日本武德會作為體育組織的一種，在鄭國銘與林丁國的研究中皆有所鋪陳討論。透過這些前行研究的成果，我們對台灣日治時期的武道發展已有頗為基本的理解與掌握。

總的來說，目前累積的研究成果，多半偏重在組織發展層面的討論。然而，大日本武德會的成立不單只是一個統籌武道發展的組織成立，更涉及近代「武道」的成立。雖如陳信安已提及「武術」更名為「武道」的歷史事實，卻未對這段歷史過程多加描述，其他研究則多半將「武道」視為一不證自明、已有固定、特定內涵的概念來使用。若不將「武術」更名為「武道」的歷史事實問題意識化，自然就無法注意到大日本武德會的成立，恰是日本邁向近代國家的過程中，國家角色強化並介入、主導對事物詮釋權的代表作之一。如此也就沒辦法更切實地瞭解修練武道對於殖民地台灣人而言可能的意義何在。此為本文將試著提出來討論的重點之一。

另外，在前述現有的研究成果中，經常將「武道」等同於「武士道」也等同於「武術」。若將三個概念混為一談，不加以仔細釐清的話，非但無法理解近代「武道」如何成立，也無法掌握近代的「武道」修練為何能發揮教化國民的效用。為此，我認為——如前所述——必須理解「武術」如何成為「武道」外，更要重省「武士道」究竟是什麼？與「武道」關係又是什麼？當然，「武術」和「武士道」的關係十分密切，無法徹底分割討論，但也正因為兩者關係密切，才更需要清楚掌握這些用語的內涵與相互關係，我相信這個作業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瞭解推廣「武道」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以及目的何在。

林丁國的研究〈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和鄭國銘的〈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體育組織及其運作的歷史考

〔註9〕 鄭國銘，〈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體育組織及其運作的歷史考察〉（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

〔註10〕 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察) 研究發表時間相近、主題也十分類同。鄭國銘的研究較偏重在組織發展，林丁國則以「體育」的觀念為中心，描繪近代體育成形的歷史，並討論來自西方的體育文化如何輸入日本、影響日本的「體育」，又如何在日本領有台灣後影響殖民地台灣的體育發展以及時人對體育的看法。這部份的討論相當具啟發性，例如體育與國力的討論等，對本文的反省有直接影響。然而，鄭國銘與林丁國皆將武道置於「體育」的視野下來理解，如此便只能窺見「武道」中身體鍛鍊也就是武術的成份，而忽視「武道」之所以是「武道」，很重要的部份在於其蘊含「武士道」道德體系。「武士道」作為思想體系，顯然與「體育」觀念的發展屬於不同發展脈落，若將「武道」簡單地視為體育的一種，在理解「武道」能達成的效用以及修練「武道」者意欲達成的目標時，很可能會失去效度。這部份也是我在這篇論文中試圖討論的另一個面向。

#### 第四節 核心論點與章節安排

殖民地台灣的武道歷史發展，多篇前行研究皆已整理得十分詳盡，本文不擬詳細重述武道在殖民地台灣的發展概況，僅在必要的時候，援引現有的研究成果，略述武道在各時期的台灣發展情況。我的重點將放在分析與武道相關的論述，藉由代表性人物的重要發言，和散佈在報章雜誌上關於武道的陳述為材料，從中指出推廣武道修練的必要性、以及使該必要性成立的思考邏輯、價值體系。「武道」或「武士道」在本文中被視為必須被重省的概念，在釐清其構成的邏輯後，其次我將指出「武道」在戰爭的時代背景下，對於殖民地台灣人而言是一種轉化的機制，探討這個機制如何運作，是本文最核心的問題意識。

為此，在第二章我將從三個方向交代近代「武(士)道」成立的背景。首先是關於大日本武德會的成立，以及「武術」成為「武道」，亦即現代「武道」成立的脈絡。其次，由於「武術」成為「武道」的歷史過程，與所謂「明治武士道」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將概述武士道的發展脈絡，由於這個問題涉及面向太廣，亦非本文核心，僅能簡要帶過。在這個部份我想呈現的是，所謂「武(士)道是日本固有國粹」的說法，事實上是種被發明的傳統，而這個「傳統」被發明的邏輯，深刻影響後人對「武道」修練的認知，並與國家如何教育國民的問題直接相關，一國影響人民最深遠者莫過於透過基礎

教育體制，因此在本章最後一節，我想提出武道與教育體系的問題，點出日本近代國家如何想像、期望「武（士）道」、並用以教化國民。

第二章將指出近代的「武（士）道」成立邏輯是依據兩組二元對立結構，這兩組二元對立結構直接、深刻地影響武道修練在殖民地台灣所扮演的角色。第三章承接這部份的討論，以武德會會長大津麟平在日本領有台灣之初、針對武道修練必要性的重要發言作為引子，指出在最初武道傳入台灣時，日本明治以來成立的「武（士）道」內涵與邏輯便已開始發揮效用。在第三章我也將意圖指出，對日本而言，十九世紀末兩場關鍵性的勝戰，大幅強化在第二章討論中歸納的二元對立結構。第一次世界大戰出現新的戰爭形式：總動員戰爭，使得武道獲得推廣的舞台，同時也加強武道作為日本國粹的主張與論述。當日本社會面臨危機，提出這項「日本國粹」作為解決方策的同時，亦不斷強化日本民族的獨特性以及異於西方文明的特質，這與日本 1930 年代後進入十五年戰爭時期後，出現「精神立國」的主張實為一脈相承。

延續「精神立國」成立的討論，在第四章將討論兩個直接影響人民生活的場域：初等教育及社會教育。在日本精神優於西方物質的二元對立思考模式，以及因應戰爭動員大量人力、物力的需求下，統治者在正規學校教育體系中持續加強國民道德教育，同時則在學校以外的教育場域創造出另一種教化模式：「道場」。此處的「道場」不止指涉宗教或武術修練的場所，而是作為一種理念或一種方法論，使得所有進入此類設施的學員在離開道場後，藉著具體的行為實踐，將所有的生活、工作場域轉化為「道場」。其所實踐的「道」，則是在天皇中心主義支配下的「臣民之道」。在這個章節將會提出一些史料，以武道修練為例，說明在道場裡修練的道德規範如何轉化到戰場上實踐。最後將重回最初的討論對象：在〈奔流〉以及張文環留下的文字中，皆能發現從道場到戰場轉化機制的運作痕跡。



## 第二章 被發明的「武（士）道」

要釐清在殖民地台灣發展的武道的功能，我認為不能簡單地將「武（士）道」視為固有、自明概念，而必須將語詞或概念的歷史發展脈絡納入視野。依據前行研究對近代武士道成立歷史的考察，可知所謂「日本固有傳統」的「武（士）道」，實則是日本進入明治時代後才成立。

本章第一小節將先交代日本明治以來扮演推廣「武士道／武道」的重要推手：「大日本武德會」的發展過程。武德會的成立，意味著明治初期一度遭到官方鄙視、排斥的武術，在重新詮釋其價值與功能，並建立現代化體系後，成功地官方願意將武術（道）納入國家體系，甚至以國家力量推廣。然而，何以當日本進入明治時代、力主西化、汲汲營營於濟身西方列強式的近代國家之際，仍舊需要舊時代的武（士）道？在第二節中將概略陳述「武（士）道」的歷史脈絡，藉以瞭解現下我們熟悉的「武（士）道」的來由，同時也能更瞭解統治者將「武（士）道」納入國家體系的動機。第三節則討論武道納入學校教育體系的歷程，審視請願書的言說與主張，可一窺時人對武道教育在日本近代國家的正規教育體制中的想像及其所能擔負什麼功能。

### 第一節 大日本武德會的成立與武道的現代化

眾所周知，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傾全力輸入西方文化並同時積極廢除原有日本傳統事物，劍術等傳統武術技法也不例外：明治九年（1876）年頒布廢刀令後明令禁止練習劍術，將「練習劍術者與破壞國家政治與秩序者同

罪」〔註1〕，明治十三年（1880）的京都府諭令非但將劍術視為無用、不合於當世，甚至「有害健康」〔註2〕。

在「文明開化」的風潮以及明治政府廢藩置縣的政策下，武士階級喪失德川江戶時期的地位，甚至連生計也陷入困境。無法在新政府內獲得官職的武術家們為求生存，只好賣藝求生，在淺草等地表演劍術、柔術、相撲等。這種表演充滿譁眾取寵的遊戲性質，與過去作為戰鬥技術的武術大異其趣，武術的「興行化」（綜藝化）招來低俗、破壞社會風俗的批評。同時，由於武術馬戲團聚集許多失去生計和地位的武術家，引發政府疑慮和警戒，便明令禁止這種表演〔註3〕。雖然武術馬戲團引來諸如「墮落的劍道」等批評，但也有人認為這種表演團反倒保留了劍術、武術的命脈〔註4〕。

社會對武道的評價持續低下期間，西南戰爭於明治十年（1877）爆發，在這場戰役中，由東京警官隊選出的拔刀隊在戰場上表現活躍，替武道贏回一些正面評價，甚至成為日後警視廳獎勵修鍊劍道以及武道復興的遠因〔註5〕。

明治二十八年（1895），政府預計在京都舉辦第四回內國勸業博覽會暨桓武天皇遷都紀念祭典，在活動前兩年的籌備計畫中，原定在祭典當天邀請藝人歌唱舞蹈以娛樂大眾。京都府稅務長鳥海弘毅得知此消息後十分憤慨，他認為桓武天皇將都城定於平安京後，大力鼓勵武術修練，而今人卻以藝妓舞蹈作為娛樂來祭祀桓武天皇，有違敬神的本意。包括鳥海弘毅等人在內的反對者，據此主張當日應舉辦演武大會，以武術家展示武技的方式對神靈致敬。可惜最後因反對者眾而一時無法如願。主事者鳥海弘毅在倡議失敗後並未放棄，轉而尋求具地位與名望的有力者支持。〔註6〕

明治二十七年（1894）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隔年日本取得勝利，成為復興武道的契機。鳥海弘毅成功邀請京都的有力人士共襄盛舉，包括皇族的小松宮彰仁親王擔任總裁，京都府知事渡辺千秋任會長，副會長

〔註1〕 山本禮子，《米國對日占領政策と武道教育——大日本武徳會の興亡——》（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2003年），頁79。

〔註2〕 井上俊，《武道の誕生》（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年），頁7。

〔註3〕 同前註，頁3~5。

〔註4〕 山本禮子，《米國對日占領政策と武道教育——大日本武徳會の興亡——》（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2003年），頁79~80。

〔註5〕 同前註，頁80。

〔註6〕 同前註，頁81。

爲平安神宮宮司（神社負責人）壬生基修伯爵。高官政要如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時任第一軍軍司令官的山縣有朋、陸軍大臣大山巖、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大藏（財務）大臣松方正義等亦聯名贊同〔註7〕。從明治二十八（1895）年公佈的〈大日本武德會規則〉中明載「推舉皇族爲本會總裁」及「推舉皇族爲本會名譽會員」等規定可知，武德會顯然有意圖藉「有力人士」的力量發展會務、拓展組織〔註8〕。另外「爲加強與全國警察聯繫，追加田中貴道（京都府警部長）爲發起人」，山本禮子便指出，大日本武德會在成立之初就已經和政界、警界關係密切，往後也有許多政府官員擔任武德會幹部〔註9〕。從這點來看，大日本武德頗有政府外圍組織的味道。

曾在前述西南戰爭時帶領拔刀隊立下戰功的大浦兼武，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接任武德會副會長。大浦曾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至三十三年（1900）間擔任第十二任警視總監，並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至三十六年（1903）再任第十四代警視總監，與警察體系關係非常密切。此外，又曾任逋信大臣（主管郵政與通信）、農商務大臣及內務大臣，並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到大正四年（1915）這段期間擔任大日本武德會會長，政界、警界與武德會的關係可見一斑〔註10〕。大浦兼武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就任副會長一職後，積極利用各地方政府的警察組織吸收武德會會員，武德會的組織規模在他擔任副會長這段期間迅速擴張〔註11〕，至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會員人數已超過一百五十萬人，同年成爲財團法人組織、並確立各地分支組織制度，將所有支部及委員部收歸爲大日本武德會本部直屬，強化中央集權體制〔註12〕。臺灣支部也是在大浦兼武擔任副會長乃至會長、迅速擴張武德會規模的這段期間成立。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成立的大日本武德會，其組織宗旨與目標，包

〔註7〕 井上俊，《武道の誕生》（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年），頁103～104。

〔註8〕 〈大日本武德會規則〉，收錄於中村民雄，《史料 近代劍道史》（東京：島津書房，1985年），頁28～31。

〔註9〕 山本禮子，《米國對日占領政策と武道教育——大日本武德會の興亡——》（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2003年），頁82～84。

〔註10〕 井上俊，《武道の誕生》（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年），頁104。

〔註11〕 同前註。

〔註12〕 山本禮子，《米國對日占領政策と武道教育——大日本武德會の興亡——》（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2003年），頁87～88。